

#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劉道玉

## 五、提心吊膽的北京大學聯絡組組長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人的造反大字報，霎時間，以陸平為首的北大黨委被衝垮了。於是6月3日，《北京日報》刊登了改組後新北京市委的決定：(1)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進行領導；(2)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3)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就這樣，張承先率領的工作組進入了北京大學，以彌補因黨委癱瘓而形成的無政府狀態。但是，當時極端民主的無政府思想已高度膨脹，絕非工作組所能扭轉的。更何況，圍繞著派與不派工作組的問題，一直存在尖銳的鬥爭。但是，江青、康生一夥一直煽動不少學校的造反派轟趕工作組，誣衊他們“鎮壓群眾”、搞“白色恐怖”，給他們羅織彌天的罪名。後來，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他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說：“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保張承先的，後來不贊成了。”後來他又說，“工作組起了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都是幹盡了壞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時隔45天，北京市委於7月

28日又發出了《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於是造反派又從揪鬥黨委書記轉向批鬥工作組負責人，張承先這位老革命也未能倖免。8月4日大學召開了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的大會，康生、江青參加了會議，並作了蠱惑人心的講話。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北京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會議期間，已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王任重同志，打電話給湖北省委，說毛主席要他抓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運動，請省委給他抽調幾個人去當聯絡員。經省委研究最後決定抽調五個人，他們是：呂乃強，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清華大學畢業，是個“大秀才”；劉道玉，武漢大學掛名而未到職的副教務長，化學講師；齊潤庭，戰鬥英雄黃繼光生前連隊指導員，湖北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武漢大學哲學系調幹學生；傅明賢，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的幹部；王桂英，武漢大學組織部幹部，武漢大學歷史系調幹學生。不用說，這五個人都是共產黨員，雖然工作能力不好評價，但是政治上是絕對可靠的。按要求，我們5個人於8月12日，也就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的當天，到達北京，住進任重同志辦公室所在的釣魚臺賓館16號樓。

第二天上午9點，任重同志在他的客廳裡召集我們5個人，以及他的秘書劉文西和警衛員曹志勤開會。他向我們介紹了全會的精神，重點地解說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說：“所有的精神都在檔裡，你們要好好地學習，反復地學習，不斷地加深理解。這還不夠，~我們還要密切注視著形勢的最新發展，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他接著說：“這次抽調你們來，是省委提出我同意的。毛主席要我聯繫北大、清華兩校，我怎麼聯繫呀？就是通過你們、依靠你們去聯繫。你們已知道了，丁工作組已趕走了，你們下去是以聯絡組的名義，會不會也被趕走呢？那也說不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說完他起身告辭，說是要去中央開會，讓秘書繼續與我們開會。

劉文西同志接著說：“根據任重同志的意見，乃強同志任清華大學聯絡組組長，道玉同志任北京大學聯絡組組長，任重同志已與劉志堅同志商妥，將從部隊各調 20 個團職幹部給你們，歸屬你們領導。傅明賢同志到清華協助乃強同志工作，齊潤庭同志負責聯絡清華附中，王桂英同志聯絡北大附中，你們下去均由中央文革小組開介紹信。”至於我們下去的任務，劉文西繼續說：“任重同志交待，你們的任務就是聯絡，不是領導，不負責解決任何問題，只看不說，只聽不表態，不支持任何一派。彙報情況用口頭方式，不打電話，也不搞書面彙報材料，一般三天彙報一次，緊急重要情況，隨時發現隨時回來報告。”

聽完了關於聯絡組性質的說明和任務的佈置，特別是派我去北京大學任聯絡組組長時，我變得越來越不自信了。我心想：黨委書記陸平是部長級的幹部，有很高的領導水準，結果被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打倒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是河北省委文教書記，工作能力很強，進駐北大 45 天又被聶元梓煽動學生把他們攆走了。與他們相比，我算老幾呢？一個 22 級幹部，小小的講師，在教授權威林立的全國第一高等學府，我說話能有多大的分量呢？這個碼頭我能站得住嗎？我真的感到很茫然，真後悔到北京來，這不是自投網羅嗎？事已至此，後悔也好，懼怕也罷，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只得硬著頭皮，於 8 月 15 日帶著中央文革小組的介紹信，隻身來到北京大學，並在招待所住了下來。

我到北京大學參加的第一個活動，是 8 月 17 日召開的慶祝毛澤東為《新北大》校刊題詞的盛大集會。我作為普通一員夾雜在群眾之中，不僅可以自由走動，而且還可以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這對瞭解情況是很有好處的。這個慶祝大會表明，毛澤東是堅決支持聶元梓為首的造反派的，北大的各派組織都有“通天”人物，因此我在與他們打交道時要格外小心謹慎。

幾天以前，一條驚人的消息傳遍了北京各大學的校園：毛主席於8月18日將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首都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代表。得知這一消息後，我們武漢來的聯絡組的幾個人，和年輕人一樣無比激動，也想一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神采，因為那時人們對他的崇拜已達到了狂熱的程度。我們幾個人找到了任重同志的秘書，向他提出了這個要求，他給我們5個人弄到了天安門城樓西檢閱台的票。凌晨3時起床，4時到達西檢閱台，然而天安門廣場上那百萬受檢閱的紅衛兵，是頭天晚上就在那裡等候了。

上午7點30分，慶祝大會在《東方紅》樂曲聲中開始。陳伯達主持大會，林彪講話。之後，毛主席等領導人在城樓上檢閱了百萬人的遊行隊伍，整個天安門廣場被“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聲浪所淹沒。11時許，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分批地會見了各地紅衛兵的代表，和他們一一合影留念。看到這一切，我真的極其羨慕那些天真的紅衛兵，而且我很希望弄到一隻“紅衛兵”的袖章，但是我最終還是沒有得到它，那時我感到非常遺憾。

8月20日，抽調的20名解放軍幹部到北京大學報到，其中解放軍空軍學院10名，負責人是嶽俊；解放軍政治學院10名，負責人是李俊。其實，來自解放軍的幹部年齡都比我大，級別都比我高，能力都比我強，我這個組長實在是名不副實。好在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工作配合默契，保證了我們那段工作的順利進行。我們進入北大以後，正面對著“革命大串聯”運動的興起，所謂“大串聯”，是北京的紅衛兵要把“首都精神”、“中央精神”傳播到全國各地，到各地“煽風點火”，幫助揭開那裡的“階級鬥爭的鐵蓋子”；外地的紅衛兵到北京要求毛主席接見，同時要把他們所受到的壓制和打擊寫成傳單遞到中央文革以尋求支持。當然，也不乏遊山玩水的逍遙派，因為當時乘車船、吃飯住宿不要錢。究竟如何對待“大串聯”呢？我們向王任重同志請示，他對我們說：“有些同學連《十六條》也不信了。實在要走也沒有關係，讓他去竄吧！東竄西竄，竄夠了還會回來的。

至多把運動推遲兩周。”事實上，那時大串聯的勢頭，猶如決了堤的洪水，是無論如何也堵不住的。

當時，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7個人已經分裂成聶楊兩派，陣容是3:4，楊（克明）派佔優勢。那時，是以人劃線，群眾也分了兩派：“新北大公社”是支持以聶元梓為首的校文革的，而“井岡山”和“北京公社”是支楊反聶的。對待兩派的態度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我曾就此請示任重同志，他說：“從群眾基礎看，聶元梓是不得人心的，政治品質也不好，但是她仗著江青的支持，毛主席又肯定了她，所以她不可一世。難啦，我們還是不表態的好，況且這也不是該我們表態的，還是任其發展吧！”

其實，聯絡組除了看大字報和參加一些群眾組織的活動以外，並沒有什麼可以聯絡的，是可有可無的擺設。到了9月底，文西同志對我們說：“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聯絡組儘快撤出來，可以回武漢過國慶日了。”我們都感到很高興，慶倖我們是自己撤出來而不是被趕出來的，算是見好就收吧！但是，上面又出現了什麼動向，下一步又會發生什麼問題呢？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令人不解的是，我卻被留下來了。任重同志對我說：“周總理想找兩個聯絡員，要你過去，10月3日他在中南海國務院小禮堂作報告，你去聽報告，會後他找你談話。”我本來已放鬆了的神經，一下子又緊張了起來，弄得我六神無主。文西同志勸道：“先去看看，然後再作定奪不遲，不必太多顧慮。”那一天，我早早地來到了會場，在會場的後排人座。周總理是作關於文化大革命與經濟形勢的報告，出席會議的有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報告完後，我走近了主席臺，有一位負責人問過我的名字後，把我引到一個小會客室，周總理已等候在那裡了。我疾步走上前與總理握手，他說：“我們過去已見過面了，你是被蘇修趕回來的。現在，我需要幾個人做點聯絡工作，你覺得怎麼樣？”我十分佩服總理驚人的記憶力，也很喜歡他和藹可親的態度，心想在總理身邊工作真是莫大的幸福。於是，我回答說：“我聽

從您的決定，服從您的一切安排。”他說：“好吧，你就回去聽候通知。”但是，幾天過去了，我並沒有得到通知，也許任重同志已得到什麼消息，總理的安排改變了，一場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的總攻就要開始了。於是，我在這種火藥味瀰漫的形勢下離開了北京，結束了提心吊膽式的生活。

## 六、“不識時務”的“保皇兵團”司令

從北京回到武漢，雖說解脫了聯絡組的工作如釋重負，但是內心卻一點也不輕鬆。面對無序的“文化大革命”，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回顧“文化大革命”5個月的過程：從“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條》，從第一張大字報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從紅衛兵興起到革命大串聯運動，從破“四舊”到層層揪黑幫……我越想越迷惑，越想越苦惱，越想對“文化大革命”越不理解。

當時，最使我迷惑不解的問題是：究竟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呢？

《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對像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按照馬列主義本來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主要是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科學、教育事業，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準，培養和造就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隊伍，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振興我國的科學和教育。很明顯，當時搞的文化大革命，並不符合馬列主義的學說。

其他想不通的問題還有：怎麼正確對待黨的領導？怎麼正確對待群眾，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嗎？什麼是“四大”，怎麼正確運用“四大”？什麼是“四舊”，破除一切傳統文化是正確的嗎？

實際上，持有與我相同觀點的人，無論是在黨內或在黨外，都占絕大多數。當時，武漢地區的群眾組織，主要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學生），“百萬雄師”（工人），他們注意政策，主張在各級黨委的正確

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另一派是“鋼二司”（學生）、“鋼工總”（工人）等，他們的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人，卻把前者斥為“保守”組織，封後者為“革命造反”組織。但是，群眾中的觀點對立，並不會是因為某一“大人物”的表態而能消除的，武漢地區的兩派一直在爭鬥著，並不斷地升級。

面對著這種局面，我應該怎麼辦？是沉默、消極、無所作為，還是堅持真理、積極投身於其中？回避不是我的個性，退卻不是真正共產黨人的品格。到底怎麼辦，我在思索著。

正在這時，武漢大學、武漢水電學院、武漢測繪學院、華中師範學院、武漢音樂學院等校的教師紛紛來武漢大學串聯，他們要求我出面，把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的教師和職工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組織，領導廣大教職工參加“文化大革命”，反映他們的聲音。他們所想的，也正是我在思考的，所以大家不謀而合。經過緊張的籌備，武漢教職工戰鬥兵團司令部，於11月5日在省委洪山禮堂成立了，我被推舉為兵團的司令，各有關學校推舉一位副司令。

兵團成立以後，省政府在第一招待所給我們撥了5間房作為辦公室，給我們撥了一筆活動經費，購買了5部自行車。兵團成立的宗旨是：堅持《十六條》的正確方針，對革命領導幹部要支持他們工作，敢於保護他們；對於有問題的幹部，在查證事實的基礎上，也要敢於批鬥。同時，要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宣傳正確的政策，批判錯誤的思潮，力使運動納人到正確的方向上。

憑心而論，當時我們成立這個兵團，是不識“時務”的，甚至是自不量力的。當時的“時務”是什麼呢？10月3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發出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攻的動員令。在10月9日，陳伯達作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而且他把區分兩條路線的標誌定義

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凡是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路線，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北京各大學又掀起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高潮，並很快波及到了全國。

武漢當然也不例外，那些造反派們更是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惟我獨尊，把持不同觀點的組織打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他們居然砸了我們兵團司令部，搶走了自行車和所有的辦公用品，用“資產階級保皇狗”的大標語，把我們辦公室的門封了。這是地地道道的打、砸、搶的行為，是任何革命者都不能容忍的。在無比氣憤下，我們兵團的傅建民、彭光銘等同志，帶著致中央文革的彙報材料和造反派給我們張貼的“資產階級保皇狗”的大標語到北京請願，請中央文革評判是與非。我們真是太天真了，哪裡知道中央文革小組本來就是被幾個陰謀家、野心家所把持的，他們正是靠打、砸、搶起家的造反派的總後台，他們怎麼會支持真正的革命派呢？他們當然是失望而歸，內心充滿著憂憤。

然而，等待傅建民的卻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迫害。他回來之後，武漢大學經濟系造反派組織“天安門”公社，在小操場召開對他的批判大會，給他戴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帽子。批判會開始時，造反派強行給他戴高帽子，但遭到這個無私無畏老紅軍後代的抗拒，他把高帽子撕碎了，並發生相互推搡。於是，一貫善於“倒打一耙”的造反派誣賴他打人，破壞批判資反路線，是現行反革命，他們勾結省公安廳的造反革命派逮捕了傅建民，在監獄裡關了6個月。這件事與我有關，他是受我的指派去北京上訪的，如果有任何責任，都應當完全由我承擔。所以，當時傅建民的女朋友裴淑娟來找我取證時，我據實寫了材料，證明傅建民是無辜的，並願承擔一切責任。

但是，當時造反派尚沒有觸動我，也許他們是怕“打草驚蛇”吧。平靜是暫時的，平靜預示著不平靜，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一場更殘酷的鬥爭在等待我！

## 七、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8月2日，陶鑄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到1967年1月被打倒，兼顧問時間僅僅5個月）；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有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最後一天，8月12日，根據毛澤東提議臨時增加了一項議程，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補選了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

1966年12月16日，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中學生萬人大會。江青在這次大會上公然當眾點名批判王任重、周榮鑫、雍文濤等，說他們是“西城糾察隊”的總後台。這不僅意味著這幾位領導同志將大難臨頭，而且一大批參加“西糾”的中學生陸續被投進了監獄。

1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又以給群眾寫信的方式表示：“可以給王任重貼大字報，他沒有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有人把給王任重貼大字報的人說成是‘反革命’進行圍攻鬥爭，這是錯誤的。”

於是，江青、戚本禹的講話，很快印成了傳單，以飛快的速度傳遍了全國。同時，“打倒王任重！”“徹底批判王任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炸開湖北省委階級鬥爭的鐵蓋子！”的大標語一瞬間貼滿了武漢三鎮。

我從大字報上看到江青、戚本禹在講話中點了王任重同志的名，本來我就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做法想不通，現在又點了王任重同志的名，於是我的抵觸情緒更嚴重了。

有一次，我和幾個持相同觀點的人閒聊，其中有我的

同事，也有我的學生。我歷來喜歡說直話，心想既然有相同想法，我就毫無遮蔽地向他們談了我對形勢的看法，發洩心中的牢騷，特別是對江青和戚本禹點王任重同志的名發表了一番評論。我對他們說：“江青和王任重同志同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一個副組長怎麼可以當著黨外群眾點名批判另一位副組長呢？這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我又說：“戚本禹算老幾！他有什麼資格點王任重同志的名，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戚本禹僅僅是個成員，這簡直是亂了章法。聽說，戚本禹只是中央辦公廳的二個 18 級幹部，與我差不多。依我看，這傢夥不是好東西，是個野心家。我準備專門收集他的材料，把他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看看他是個什麼貨色！”我一口氣講下來，當場幾個人也附和我的觀點。當時我心裡感到少有的痛快，畢竟說出了壓在心底想說而沒有說的話，但是未料到這些話幾乎使我遭到殺身之禍！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與人的關係完全變成你是我非的“路線之爭”的關係，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係。那時，人性遭到扼殺，心靈受到扭曲，沒有誠實可言，“謠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在造反派中，流行兩句很時髦的口號：“揭老底”和“反戈一擊”，甚至成立專門“揭老底”戰鬥隊，寫出了“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的大標語，鼓動不同觀點的人向對方揭發自己同夥的言行。

元旦以後，武漢的天氣異常的寒冷，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卻搞得熱火朝天。一個陰森的黑夜，造反派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一項重大的謀劃，種種跡象表明，這是沖著我來的。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彈——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

凌晨 7 時，“造反有理”校廣播台開叫了，先是播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下來是朗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這時，本來就是高音的喇叭又提高了八度，只聽一對男女播音員拉大嗓門叫喊著：“特大新聞，特大新聞！

經我革命造反派連續戰鬥，現在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接著就是一連串的震耳口號聲：

“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劉道玉揪出來示眾！

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誰反對中央文革就砸爛誰的狗頭！

劉道玉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

打倒頑固不化的鐵杆保皇派劉道玉！

打倒王任重的走狗劉道玉！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劉道玉！

我在第一時間內，聽到了關於我的“特大新聞”，我雖說感到突然，思想上也有些緊張，但我也有一定的思想準備，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是要到來的。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從精神和身體上作好準備，去承受即將到來的苦難，決不能屈服於造反派的淫威。

不用說，肯定是我們同派人中出了“甫志高”，又出了“反戈一擊”的立功者。由於我談話的時間、地點和在場的人，仍歷歷在目，無須明言，我能猜出十之八九，是最受我們信任的化學系的一個女學生揭發的。

說時遲那時快，早飯後一群造反派學生氣勢洶洶地來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說“沒有黑材料”。他們不信，於是七手八腳地翻箱倒櫃搜查，他們當然搜查不出什麼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況下，他們把氣往我身上發洩，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鬥。所謂批鬥，也就是遊鬥，也叫遊街示眾。大約 100 多名造反派，大多是學生，也有少數教職工。他們打著造反派戰鬥隊的旗幟和五彩旗，敲著鑼鼓，把我押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頸子上掛著沉重的黑牌，上面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我的名字上還打上了紅 XX。我的雙手由兩個身體魁梧的造反派反剪在背後，一邊走一連呼喊“打倒劉道玉”的口號。遊鬥是沿著校園環形大道進行的，整個馬路上，用鬥大的字寫滿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樣的大標語，我低著頭看得一清二楚。

每到一處交叉路口，他們都要停下來，召來許多圍觀的群眾，勒令我低頭彎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頓拳打腳踢。遊鬥終於結束了，儘管是三九寒冬，但一個上午遊鬥下來，我已是大汗淋漓，渾身沒有了一點力氣。我拖著沉重的腳步，沿著環山路吃力地朝家裡走，到了水廠附近，迎面來了一個騎自行車學生模樣的人。他看到我以後，喝令道：“站住，黑炮手！”當我抬頭看時，他已站到了我的面前，揚手就是兩耳光，打得我的臉上火辣辣的。臨走時，他還罵罵咧咧地大聲喝道：“劉道玉，給老子放老實一點，不徹底交待罪行，小心你的狗頭！”這又是化學系我的一個學生，後來他留校當了教師，入了黨，也當了教授。但是，我從來就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反省自己錯誤的話，難道“文化大革命”只是觸及別人的靈魂，而不需要觸及自己的靈魂嗎？那你又怎樣為人師表呢？

在以後的十多天裡，每天我必須到“9·12先鋒隊”去報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我就事論事地把我對中央文革個別人的議論寫了出來，決不上綱上線，也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雖然他們對我的交待極不滿意，也很少遭到他們的毒打，但我始終堅持決不能胡寫，也不隨便認錯。那時，保護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說或儘量少說話，我默記著一句日本諺語：“沉默是金，雄辯是銀。”在橫蠻無理的非常時期，不要指望澄清什麼事實，也不可能有誰給你分辨是與非，最好是保留自己的發言權，總有一天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元月下旬，北京大學專揪劉道玉戰鬥隊到了武漢大學，他們要揪我到北大交待聯絡組的問題，真是禍不單行啊！雖然我不奢望北大的造反派會對我更文明一些，但是我還是願意去，因為我對聯絡組的問題心中有數，不像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壓死人，至少可以逃避一下眼前的殘酷鬥爭。當然我心裡也知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唉，也管不了那麼多，躲一回是一回，無非是等到秋後算總帳吧！

到了北大以後，我被關在 38 號樓一樓的一間屋子，一個“井岡山”紅衛兵監管我。他們規定我的任務是交待聯絡組的問題，揭發王任重如何插手北大的運動，如何在背後支持聶元梓的。其實，聯絡組在北大根本就沒有錯誤，我們沒有講過一次話，沒有召開過一次會議，更沒有鎮壓群眾運動。至於對待聶元梓，王任重同志和我對她是有保留的，更談不上背後支持她的問題。幾天後，也許是受了凍，我上吐下瀉，到北大校醫院診斷為急性腸胃炎，被收住院治療。一星期後出院，造反派看我實在寫不出什麼東西，也就放棄了對我的監管，任我自由地去看大字報。這次被揪回北大，既沒有召開批判我的大會，也沒遭受皮肉之苦，算是夠幸運的了。鑒於春節臨近了，大家都準備回家過年，我也獲准 2 月 8 日春節的前 3 天回到了家裡，總算闔家過了一個團圓的年。

## 八、第一次逃亡生活

在我的一生中，曾經有過 3 次逃亡生活，雖然每次逃亡的背景和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打亂了我的平靜生活，給我的家人也造成了一定的痛苦。

我的第一次逃亡，是發生在 1967 年五六月間。在此前後，無論是全國或是武漢，“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也一步一步地被拖進了危險的境地。

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揭開了奪權的序幕。1 月 2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其中寫道：“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但是，在派別矛盾滅化的狀態下，要奪權就必然發生尖銳的衝突，出現武鬥是不可避免的了。上海的造反派的頭子王洪文，為了奪權，製造了有十多萬人參加的武鬥流血事件，開創了全國的大規模武鬥極為惡劣的先例。

2月24日，周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碰頭會，參加會議的有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領導人，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也參加了。以譚震林、陳毅為首的一些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不正常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但是，江青、張春橋一夥人氣急敗壞地攻擊老師們走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通過控制的造反派，在全國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惡浪，喊出“打倒譚震林”的口號，要揪出“二月逆流”的總後台，矛頭直接指向了周總理。

三四月份，全國形勢更是急轉直下，“揪軍內一小撮”之火在全國蔓延。造反派成立了“敢死隊”，開始衝擊軍事要地，搶劫軍隊倉庫的槍支、彈藥，喊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全國範圍內的武鬥逐步升級，一派殺氣騰騰的慘像。

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一周年，武漢地區的革命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造反派組織分別組織大規模的橫渡長江的慶祝活動，表示他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奮勇前進。對於像我這樣跟“當權派”沾邊的人，況且還背負著“炮打中央文革”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對於這類活動，我更是離開得遠遠的，既沒有心思參加也不敢去看熱鬧。後來，從大字報上獲悉，造反派在組織渡江時，由於連接躉船的踏板脫落，不少人掉進了江裡，也死了一些人。到底死多少人，不得而知。據造反派自己說，死了200多人，而且他們倒打一耙，說是“百萬雄師”搞破壞造成的。而“百萬雄師”當然加以否認，並揭露說，這是造反派一貫玩弄的“賊喊捉賊”的伎倆。渡江以後，兩派的新仇舊恨進一步加深了，相互襲擊、抓人的事件頻頻發生，凡他們認定的“首惡分子”，一旦被擒，不是打傷致殘就是迫害身亡。

正是在這種明火執仗的情形下，“5·16”渡江後不幾天，在武漢大學的大字報欄裡貼出了“口號報”：

“把‘百萬雄師’的黑高參劉道玉揪出來！

把‘百萬雄師’‘5·16’渡江總指揮劉道玉揪出來！

把迫害我革命造反派的兇手劉道玉揪出來！

向劉道玉討還血債！

血債要用血來還！

徹底清算劉道玉的新老罪行！”

真是晴天霹靂，莫須有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其實，我並沒有直接看到這張充滿殺機的“口號報”，一直還蒙在鼓裡。一天早上，我到一區食堂去買早餐，正好碰到化學系一位元同事，他對我說：“昨天貼出了你的口號報，那都是要命的話，很多好心人都十分關心你的安全，看來你必須躲一下。”幾乎與此同時，我的一位元也在化學系當教師的大學同學，急忙找到高偉說：“我的師弟告訴我，他的工人戰鬥兵團開會決定，要聯合校外的‘鋼工總’，對劉道玉要採取行動，他們說他是‘百萬雄師’的高黑參、黑後台。”我同學的師弟是武大造反派工人戰鬥兵團的頭頭之一，他與我同是1954年防汛搶險隊的隊員，我與他個人交情也不錯，他雖然派性十足，但是在我的生命攸關的時刻，他沒有忘記舊誼，對此我還是感謝他的。

就在傳遞這兩條消息後，武大校園裡的氣氛一直是十分緊張的。有消息說，“百萬雄師”幾日內要血洗武大的造反派，還繪聲繪色地說我家陽台上掛了一個拖把，那就是與“百萬雄師”的聯絡信號。種種跡象表明，有人正在編織一張“百萬雄師”的網路，硬是要把我置於這個網絡的中心聯絡點。真是太危險了，如果“十萬雄師”與造反派之間發生任何不良後果，他們都會加罪於我。鑒於情況危急，我和高偉商量，事不宜遲，斷然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一個月明星疏的夜晚，儘管兒子毛毛睡得很香熟，可我倆怎麼也不能入睡。高偉說：“不能等到明天，今夜必須離開家裡，誰知災難發生在哪一瞬間呢！”於是，我們清理了換洗衣服，我抱著熟睡中的4歲多的兒子，關鎖好了門窗，趁夜深人靜，出走了。是夜，我們並沒有離開學校，而是躲到我的同事家裡。那時，出門怕有人跟蹤，不能徑直去目的地，而是要繞道或者多次轉移才能到達我們所要藏匿的

地方。第二天晚上，我們抄小路離開學校，乘車到漢口的一個同學家裡，待夜深人靜以後，我們才轉移到高偉的二堂兄家裡，開始了近兩個月的逃亡生活。

我們親戚家在漢口古田地區，這是個新興的工業區，擁有許多化工、冶煉、電訊器材工廠，在這些工廠中“百萬雄師”的勢力十分強大。高偉的堂兄和堂嫂，也是支持“百萬雄師”觀點的工人。“百萬雄師”是工人的革命組織，它是以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的詩句命名的，這個組織號稱百萬絕非吹牛，如果把支持和同情它的其他各階層的群眾包括在內，恐怕200萬也不止。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支持它呢？因為在“百萬雄師”中，有三多：黨員多、老工人多、勞動模範多。一般來說，他們講究政策，實事求是，擁護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代表了社會的正氣，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因此，他們是“抓革命促生產”的主力，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逃亡生活並不是逍遙自在的，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多憂國憂民，雖說眼前還不是山河破碎，但全國一片混亂，又何以能靜得下心來呢？每天憂心忡忡，任何書也看不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收集來的各種版本的“紅衛兵戰報”、“革命傳單”和“馬路消息”，以圖找到能讓人寬心的好消息，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關於整治混亂局面的最新指示，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心想：“毛主席呀，你不是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嗎？難道現在還亂得不夠嗎？還將亂到何時呢？”眼前還不是山河破碎，但全國一片混亂，又何以能靜得下心來呢？每天憂心忡忡，任何書也看不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收集來的各種版本的“紅衛兵戰報”、“革命傳單”和“馬路消息”，以圖找到能讓人寬心的好消息，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關於整治混亂局面的最新指示，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心想：“毛主席呀，你不是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嗎？難道現在還亂得不夠嗎？還將亂到何時呢？”

每當聽到高音喇叭廣播車在街上奔馳的時候，我也到陽台觀看一下，那情景讓我驚駭不小。有時候，卡車滿滿裝著頭戴柳條安全帽，手持長矛的工人，少則幾十輛，多則幾百輛，兩派觀點的群眾都有。每逢這種情況，就預示著在某地正在或即將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武鬥。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就有廣播車上街叫喊或散發傳單，抗議對方製造 XX 流血事件，並發誓要報血海深仇，面對這種武鬥有增無減的形勢，武漢軍區做工作已經無濟於事，因為中央文革明確支持要打倒武漢軍區的“一小撮”。同時，中央文革從對“工人總部”的暗中支持轉化為對“百萬雄師”的公開指責。於是，矛盾進一步激化，激起了“百萬雄師”群眾的更大的憤慨，一場更重大事件的爆發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在這個時候，武漢大學“三司革聯”（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聯絡總部）司令費克俊，通過中間人與我取得了聯繫，他希望我支持他們，並參加他們設在洪湖縣境內的一個聯絡站的鬥、批、改活動。那時，各造反派組織都在尋找他們認為信得過的革命幹部，以便作為日後奪權時的“三結合”幹部。費克俊是哲學系五年級黨員調幹學生，我們是文革初期認識的，我對他有良好的印象。鑒於他們對我的理解與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和校內問題上我們有相同的認識，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請，於是，7月初我和他一起乘小火輪來到位於長江岸邊的洪湖縣燕窩區的“三司革聯”的聯絡站。該站只有七八個人，有教師也有學生，而且那些教師我都認識，他們對我也都很客氣。他們的任務是整理武大“三家村”的材料，決不允許為“三家村”翻案，而校內“鋼二司”是要為“三家村”翻案的。他們希望把整理的材料報到中央文革去，以此證明自己是造反派，而“鋼二司”是保走資派的，對此他們都抱有極大的幻想。

其實，我在那裡並沒有什麼事可做，材料工作已有分工，我插不上手。於是，我每天幫他們刻鋼板，推油印機，印刷各種資料。有時，也到食堂幫廚，做一些擇菜和洗碗之類的雜話。傍晚也隨大夥來到江邊，觀看垂釣的、捕魚的。

看著滾滾東流的江水，我的心潮也是起伏不平地激蕩著，心想：大家的勞動總不至於像這江水白白地流淌了吧？

事情的發展，有時竟違背大多數人的良好願望，向著逆潮流的方向發展，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戲劇性的疾變，正是應了這一反常規的法則。自7月14日到20日，武漢地區兩派群眾展開生死的搏鬥，同時“百萬雄師”也同中央文革派到武漢支持造反派和鼓動揪軍內“一小撮”的王力進行激烈的交鋒。20日凌晨，王力被激怒了的軍民抓到軍區大院，要他回答問題。接著，武漢軍民紛紛擁上街頭，數千輛大卡車載著工人、農民和駐漢部隊指戰員，排成四路縱隊，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打倒王力”的口號響徹武漢三鎮，並一直持續到23日。這就是震動全國的、遠播全世界的“七二〇事件”。

然而，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國發出了“緊急通知”，把“七二〇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給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扣上了“反革命兵變”的帽子，把“百萬雄師”等群眾組織打成了保守組織，並號召全國各地聲討“七二〇”反革命事件。 -

我們是7月23日從廣播中聽到中央文革的“緊急通知”的。聽後大家都很洩氣，同時又憤憤不平。但又有何用呢，畢竟胳膊扭不過大腿。於是，大家提出結束聯絡站的工作，各奔東西。當天，大多數人都回家了。我也買了船票回到了漢口親戚家。第二天我和高偉帶著兒子回到了武大，接著把兒子送到鄉下二姨家，以便我們無牽掛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殘酷的現實。

## 九、虎口餘生

“七二〇”以後，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由於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更顯得飛揚跋扈，把他們對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的仇恨，很快轉移到曾經支持軍隊和“百萬雄師”觀點的幹部身上。因此，造反派揚眉吐氣之日，也就是革命幹部受難之時。

7月25日，我從校廣播台播發的勒令中知道，要我8時到校農場報道，去後發現有四五十人，均是被造反派列入要打倒的人，其中有“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壞頭頭”。一個造反派的頭頭對我們訓斥說：“你們都知道犯了什麼罪嗎？你們支持‘反革命暴亂’，支持陳再道‘兵變’，你們犯下了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罪，罪責非常嚴重。現在，你們的後臺陳再道已經完蛋了，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只有老實交待問題，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鬥，才是惟一的出路。”接著他惡狠狠地宣佈了紀律：每天必須準時到這裡接受勞動改造；白天勞動，晚上寫交待罪行材料；必須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鬥，隨叫隨到。最後，他揚了揚手中的鋼絲鞭叫道：“有違抗者，後果自負！”從這一天起，我就成了“勞改隊”的一員，在造反派鋼絲鞭的揮舞下接受“改造”。

那時，正是早稻收割的季節，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和挑穀坨子。割穀還算好，雖然也弄得腰疼背酸，但是還能挺得過去。最難忍受的是挑穀，一般人每次只挑兩捆，不知為何原因，造反派強令我們少數幾個人，每趟必須挑4捆，也許是對我們幾個“頑固分子”的懲罰。濕穀坨子很沉，4捆穀坨足有200斤，用釘擔根本不可能甩起來，於是造反派就喝令兩個人，抬著穀坨子強行架在我的肩上。儘管我使出全身的力氣，但走不了幾步就壓隊下了，為此，我不知挨了多少次鋼絲鞭的抽打，身上傷痕累累。我出身農村，不怕勞動，但是把勞動作為懲罰和折磨人的手段，這是對勞動本身神聖意義的褻瀆，也是一種犯罪的行為。

8月10日，這是我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我把它稱為“黑色的星期四”。因為就是在這一天，造反派差一點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沒有被造反派用槍崩掉，大概是命不該死吧！

事情是這樣的：在“七二〇”以前，武漢大學有一個13級的老幹部，他鑽進了造反派組織，並成了他們的高級參謀。“七二〇”以後，他認為武漢大學的造反派思想右傾了，對走資派和反對中央文革的人鬥爭不堅決，因此他要求

在造反派內部反右傾。在此基礎上，他們策劃了8月10日的批鬥會和會後的武裝遊鬥。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實行紅色的恐怖，強化對走資派的專政，大滅敵人的威風，大長革命造反派的志氣。”

8月10日的批鬥會，是在理學院103教室進行的，是以化學系造反派為主召開的，雖然規模不大，但是火藥味十足，而且是他們在“七二〇”以後，召開的第一個批鬥會，妄圖開成一個樣板會，肯定有一場好戲。批鬥會開始，黨委書記莊果、副書記蔣蒲和我一串“走資派”被帶進了批鬥會場，我們被押站在講臺的前面，我未敢抬頭看那批鬥會的橫幅是怎樣寫的，但教室的圓柱上的標語是：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莊果！打倒資產階級的孝子孝孫蔣蒲！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那時，開批鬥會有主鬥和陪鬥之分，也就是說召開學校批鬥走資派的大會，系裡的小走資派也要被揪去陪鬥。由於被批鬥的疼數多了，我們也就總結出了經驗，就是要判明自己處於什麼地位，如果是主鬥，那就要全神貫注，揣摩如何回答追問；要是陪鬥，就可以稍稍鬆口氣。種種跡象表明，那天的批鬥會我是主鬥，其他人都是“陪鬥”的，決不可以掉以輕心。

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口號聲中，批鬥會開始了，有一個“為人民服務”戰鬥隊的代表首先發言，歷數了我的所謂罪行。接著，一個叫做黎進軍的造反派頭頭，怒氣衝衝、罵罵咧咧地沖到我的面前吼道：“劉道玉，你他媽的為什麼要反對中央文革？你該當何罪？”我不語，心想既不能說是又不能說不是，還是恪守著“沉默是金”那句箴言。他看我沒回答他的問題，更是惱羞成怒，冷不防掏出手槍對準我的左胸捅了下去，由於用力太猛，把我打倒在地，並踏上了一隻腳，當他準備再次舉槍時，被眼尖手快的站在一旁的一個造反派教師頭頭把槍奪了過去，並立即退出已上了膛的子彈，在場的人也嚇了一跳。真是生死一瞬間，要是黎進軍捅下去時扣動了手槍的扳機或第二次舉槍射擊，正好不偏不倚地打中我心臟，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當我被扶起來的時

候，我的左胸部的襯衫和汗衫被手槍捅破了，胸部傷口的鮮血也把襯衫染紅了一片。

批鬥會結束後，是武裝遊鬥，這是過去沒有過的，也算是“七二〇”以後造反派的又一發明創造吧。所謂武裝遊鬥，就是模擬對犯人假斃的樣子，其目的是從心理上打破我們的防線，從精神上把我們摧毀，以便使我們受到威懾，老老實實交待自己和揭發他人的罪行。在武裝遊鬥時，我們這些掛著黑牌子被批鬥的人，成三路縱隊走在最前面，我們的身後是荷槍實彈的“紅衛兵”，再後是呼口號助威的群眾。在遊鬥過程中，數十支步槍齊鳴，雖然是朝天射擊的，但是聽著那震耳欲聾的槍聲，猶如進入了戰場。雖說我是頭一次經歷這種場面，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一絲懼怕的感覺。在那瞬間，我立即想到了我的一個解放軍朋友對我講述的打仗的感受。他說，戰士在未上戰場之前，是有些怕，但是到了戰場上聽到槍聲以後，他就什麼也不怕了，因為他知道怕是沒有用的，只有不怕才有生的希望。此時此刻，我不也是置身於戰場之上嗎，絕不能被對方的氣焰所壓倒，一定要堅持到底。

“8·10”武裝批鬥以後，我從農場勞改隊移交到造反派的專案組，我知道這個轉移意味著鬥爭的深化，一場對我審查的攻堅戰已經開始了。造反派們也知道，要給我定罪，沒有過硬的材料是不行的。為此，他們既要拿到我的交待材料，同時還必須廣泛收集對我的揭發材料，為了達到陷害我的目的，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不惜大搞逼、供、信。

一天下午，我被帶到設在“工農樓”的專案組審訊室，由“革干團”的一名幹部負責審訊。此人是校團委的一名幹部，本來我們是很熟悉的，但現在他視我為仇人，怒目而視。審訊開始，那位主審我的人坐在一把籐椅上，我當然只能在他的對面站立著，我的四周站著戴袖章的紅衛兵。我們面面相覷，相互打量著對方，他也許在觀察我的表情，而我倒是要看一看這第一回過堂將怎樣開始。相持局面終於打破了，

那個幹部神氣十足地學著審判官的樣子，把手上類似於驚堂木的一塊木頭往桌子上用力一拍，大聲吼道：

“劉道玉，你知道犯了何罪嗎？”

“不知道。”

“‘百萬雄師’‘5·16’渡江是不是你指揮的？”

“絕對不是的。”

“你不老實，人證物證俱在，殺害我革命戰士的罪責你是逃脫不掉的。

” “根本不存在的事，你們也不可能有人證物證。”

我的回答，遭致了紅衛兵的一陣拳打腳踢，接下來，他們反復讓我交待與“百萬雄師”的關係，參加了哪些活動，連絡人是誰。我心中最清楚，這些都是莫須有的，他們實際上什麼材料也沒有，只不過是誑而已，對此我以沉默拒絕回答。審訊直到晚飯時，仍沒獲得他們所需要的隻言片語。於是，那個幹部對紅衛兵說：“劉道玉是個頑固不化分子，你們帶回去再審問吧，他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人。”

於是，我被帶到四區學生11舍109室，這本是一間住人的宿舍，但現在已把床架搬走了，裡面放了幾把椅子，有一條長凳，桌上放了幾根皮鞭，牆角裡堆了一些棍棒，窗戶被厚厚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的。我環視了一下，心裡明白了一大半，這是一個地下審訊室，弄到這裡受審，肯定是有苦頭吃的。不一會，黎進軍帶著幾個紅衛兵進來了，他看見我就破口大罵：“劉道玉，你他媽的不老實，今晚你不交待清楚與‘百萬雄師’的關係，老子決不會饒你。”另一個紅衛兵說：“你說呀，早說早解脫。”我說：“下午我已說了，沒有補充的。”我的話音剛落，黎進軍的皮鞭已抽在我身上了，其他紅衛兵也圍上來一頓拳打，我被打倒在地，他們又用腳踢。我疼痛難忍，也沒有力氣爬起來了。他們一直把我折騰到晚上10點鐘，也許他們也打累了，於是讓我滾蛋。

我也不知是怎樣艱難地摸回家的。高偉也許期盼著很久了，當看到我安全地回來了，她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但她看到我身上累累的傷痕時，她痛心地哭了。她為我清洗

傷口，敷藥包紮，用松節油擦搓關節，促進血液流通，以減少疼痛。她還買來補品，調理生活，從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持我堅持下去。我們都堅信：天越是黑暗，就說明黎明已，離我們不遠了。

我正在遭受煎熬時，一張要命的揭發我的大字報貼了出來，寫大字報者在大字報中揭發說：“1966年6月底，劉道玉讓我從北京帶回一包材料給蔣蒲。他送我上火車時說，這份材料很重要，千萬不能丟失，你要做到人在材料在。”她在最後還警告說：“劉道玉，你是什麼黑材料那麼機密，要我人在材料在。現在快把黑材料交出來，劉道玉不投降，就叫你滅亡！”又是一顆炸彈，弄得一些好心人又為我捏著一把汗。造反派又如獲至寶，又把我拉到審訊室追問，幸好我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所謂黑材料，就是我在北京保劉、羅時，向學校寫的一封彙報信，還摘抄了有關劉仰嶠的大字報的材料。事情很快查清楚了，蔣蒲也證實我說的是真實的，所以這份揭發材料對我沒有造成多大的威脅。

下一次過堂的內容是什麼呢？我不斷地猜想，以便有所準備，但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猜著。一天下午快到下班的時候，我被帶到“工農樓”的那間審訊室，還是那位“審判員”在等待我，這一次他倒是開門見山地問道：“劉道玉，你老實交待是怎樣受蘇修派遣充當他們特務的？”聽後，我如墮五裡霧中，這是從何說起呢？我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在蘇聯的表現人所皆知，我明明是被蘇聯當局驅逐的，怎麼成了蘇聯特務呢？”他又說：“怎麼不可能！你知道什麼是苦肉計嗎？你就是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裡的孫猴子。”我心想，這完全是亂扯，不必去理會他。看我沒有說話，他又說：“今天時間不早了，不再繼續審問，不過提醒你，上海有人揭發你，不久前有人來調查，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寫成書面材料交來。”

經過那位幹部提醒，我倒是想起來了，前不久，上海某研究所的外調人員找過我，調查該所一位我熟識的教授，他曾被當做特務審查，最後屈打成招。他們在其筆記上，曾

發現記有蘇聯留學生會主席劉道玉，他們感到很疑惑，他與我到底是什麼關係，他記我的名字幹什麼？聽後，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從蘇聯回來後，當年12月在上海衡山飯店召開全國有機氟化學學術討論會，這位元先生是國內搞有機氟化學研究的元老，並安排我在會上作了一個反修的報告，其中我講到了我是留蘇學生會的主席，這位先生就是在這次會上作的這記錄。據此，我寫了外調材料，由於我的證詞，使上海那個研究所解除了對這位教授的懷疑，但又未想到，武大的造反派竟懷疑我是蘇修特務，這簡直太離譜了，對此我只是一笑置之。

在接受審查和批鬥期間，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問題發生。本來是熱天，但每次去參加批鬥會或是受審，我都要穿上長衫長褲，以盡可能減少皮肉之苦。在那無法無天的年代，說實在的，早上被揪出去，誰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呢。所以，在那個淒楚的日子裡，為防不測事件的發生，我甚至向高偉說出了類似遺囑的話：“我被揪走以後，萬一回不來，那一定是出事了。如果真是遇難了，你不要難過，要堅強一些，不必去尋屍收屍，化悲痛為力量，把兒子撫育成材。我遺憾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我死不瞑目，希望你有朝一日為我昭雪。”說完後，我們傷心地緊緊擁抱在一起。

連日以來，我的心神一直不太安寧，總是擔心造反派會對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這一天終於到來了。一天晚飯後，化學系，9·12”先鋒隊的幾個紅衛兵到我家，說是要帶我去接受批鬥。我心想已經這麼晚了，揪去肯定沒有好事，真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呀。我又被帶到那間“地下審訊室”，我進去後，看到屋內沿著牆壁已經跪了一圈人。我人尚未站定，一個人高馬大的紅衛兵對著我踹了幾腳，吼道：“還不快跪下，等什麼，是不是等死呀！”看那陣勢，不難看出今晚又是一場“武鬥”。



這時一個造反派頭頭沖了進來，他站在屋子中間，一隻手插腰，一隻腳踩在一條長凳上，他訓斥道：“你們這些壞蛋，沒有一個老實的，要你們交待罪行，你們不是抵賴就是避重就輕，今天晚上來給你們‘端正態度，讓你們尝尝它（指著腳下的老虎凳）的滋味！誰不老實，今晚就別想走出這個房門。”說完後，我的一個同學已被他們拉到老虎凳上。

可憐哪，我的同學什麼官銜也沒有，只因為他出身地主家庭，對文革持強硬的保守觀點，所以造反派每每都是拿他開刀，他有嚴重的腰傷和腿傷，怎麼經得起這般折磨啊。大約十幾分鐘，我的同學大汗淋漓，只聽“撲通”一聲，他從老虎凳上摔了下來，再未聽到他呻吟的聲音。紅衛兵端來了一盆涼水，對著他的頭潑了下去。正在這時，樓道裡的高音喇叭響了，很清楚地聽到：“緊急通知，緊急通知，請我革命造反派戰士全副武裝，馬上到‘工農樓’前集合，執行緊急任務。”這時，黎進軍又罵了起來：“他媽的，算你們走狗屎運，你們統統滾蛋，老子改日再收拾你們。”紅衛兵都走了，我的同學開始甦醒了，我扶起了他，解開捆綁在他膝蓋上的繩子，說：“造反派緊急集合走了，可能又去搞打、砸、搶，我們雖又躲過了一劫，但這股禍水不知流向哪裡，災難又將會落在誰的身上！”

自此以後，我就是在這種鬥鬥停停的忐忑不安中度過的。但是，從1968年春節以後，由於造反派忙於奪權，放鬆了對我的審查，只是安排我們每天上午去學生宿舍打掃廁所，下午讓我們在家裡寫交待材料或學習毛主席著作。3月份，北京社會上掀起了打倒“變色龍”、“小爬蟲”式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廣泛宣傳，很快他們被關進了監獄。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塊石頭落下了地，從此沒有人再敢追究我所謂“黑炮手”的責任了。但是，我並不感到多少輕鬆，文化大革命已進行整整兩年了，人民群眾包括絕大多數的紅衛兵在內，對派性已感到十分反感，渴望盡快整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人心思治啊！

（未完待續）.....